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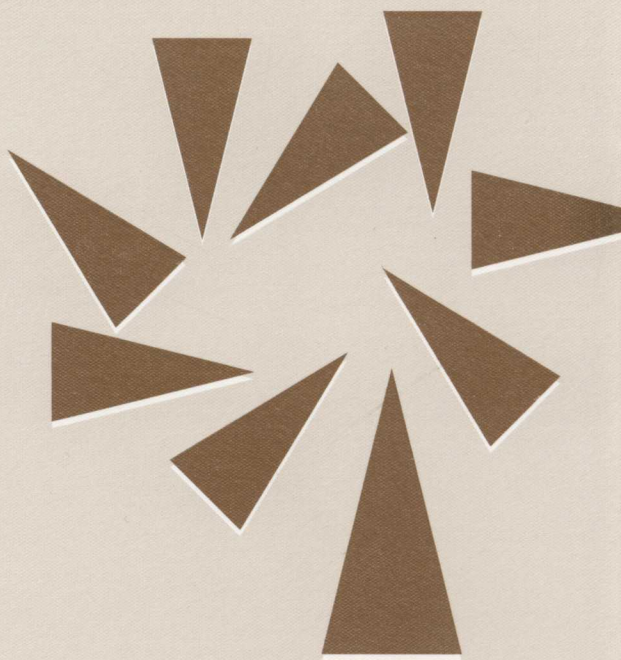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期成果
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II

资产阶级与 中国近代经济及社会

Bourgeoisie & Chinese Modern
Economy and Society

虞和平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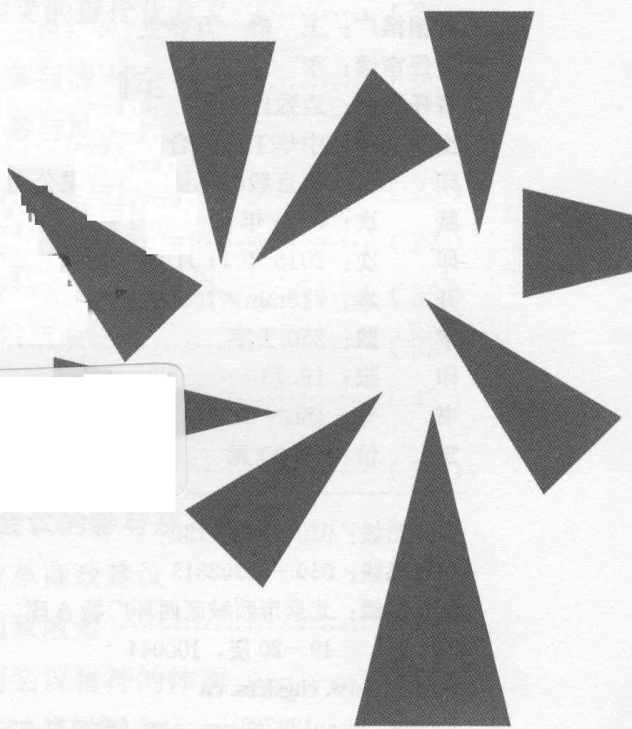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期成果
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II

资产阶级与 中国近代经济及社会

Bourgeoisie & Chinese Modern
Economy and Society

虞和平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经济及社会/虞和平著.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5. 12
(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 2)
ISBN 978-7-5158-1525-1

I. ①资… II. ①虞… III. ①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②中国经济—研究—近代③社会发展—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D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9408 号

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Ⅱ

资产阶级与中国近代经济及社会

作 者: 虞和平
出 品 人: 徐 潜
策 划: 王宝平 魏鸿鸣
责任编辑: 魏鸿鸣 林 立
装帧设计: 周 源
营销总监: 曹 庆 郑 奕
营销推广: 王 静 万春生
责任审读: 李 征
责任印制: 迈致红
出版发行: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20mm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9.75
书 号: ISBN 978-7-5158-1525-1
定 价: 61.00 元

服务热线: 010-58301130
销售热线: 010-58302813
地址邮编: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 A 座
19-20 层, 100044

<http://www.chgslcbs.cn>
E-mail: cicap1202@sina.com (营销中心)
E-mail: gslzbs@sina.com (总编室)

工商联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58302915

目 录

第一章 清末民初资产阶级的实业救国潮流	
与经济民族主义	(1)
第一节 实业救国与经济民族主义思想	(1)
一、郑观应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和“商战”论	(1)
二、实业救国思潮的经济民族主义色彩	(7)
三、实业救国论的理性化民族主义观念内涵	(11)
第二节 实业救国与经济民族主义行为	(15)
一、实业救国的理性化民族主义行为取向	(15)
二、收回利权运动与实业救国的第一次高潮	(18)
三、实业救国的成效与理性化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意义	(20)
第二章 资产阶级与清末民初的经济法规制定	(23)
第一节 资产阶级对制定经济法规的参与	(23)
一、参与清末时期经济法规制定	(23)
二、参与民国时期的经济法规制定	(27)
第二节 资产阶级参与经济法规制定的效果	(33)
一、政府与商会的合作和互动	(33)
二、资本主义经济法规体系的初步建成	(43)
第三章 资产阶级的政府经济决策参与	(52)
第一节 资产阶级对 1912 年全国工商会议的参与及其影响	(52)
一、工商会议上的工商界代表及其改革商政建议	(52)
二、工商会议与工商总长刘揆一的施政政策	(58)
三、农商总长张謇的经济政策与工商会议精神的体现	(61)
第二节 资产阶级对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决策的参与	(70)
一、工商界对全国经济会议的参与	(70)

二、工商界对全国工商会议的参与	(75)
第四章 商会与近代商事仲裁制度建设	(82)
第一节 清末时期商会商事仲裁制度的产生	(82)
一、商会的商事仲裁职责及其现代性	(82)
二、从商事裁判所到商事公断处	(86)
第二节 民国时期商会商事仲裁制度的进步与发展	(90)
一、商事公断处的法制化和普及化	(90)
二、商事公断处规则的修改	(98)
三、商事公断处的推广和作用发挥	(113)
第五章 资产阶级与新式教育的发展	(122)
第一节 商会对实业教育的提倡和推进	(122)
一、商会对实业教育的思想认识	(122)
二、商会敦促政府和工商界发展实业教育	(126)
三、商会的兴学育才实践	(130)
第二节 辛亥革命后商人的捐办大学活动	(136)
一、辛亥革命催生商人捐办大学的新平台	(136)
二、商人捐兴大学教育的动机和投入	(142)
三、商人捐兴大学教育的意义	(153)
第六章 资产阶级与清末民初民间经济外交的兴起	(158)
第一节 世界博览会的民间经济外交功能与中国人的认知	(158)
一、早期世界博览会的民间经济外交功能	(158)
二、1910 年前中国人对世界博览会经济外交功能的认知	(165)
第二节 资产阶级对世界博览会的参与及民间经济外交意义	(171)
一、南洋劝业会与民间经济外交的开端	(171)
二、巴拿马世博会与中国商人经济外交的进步	(175)
第七章 清末民初中美商会的互访和合作	(183)
第一节 中美商会和合作意向的产生	(183)
一、日本和美国商会代表团的来访	(183)
二、中美经济合作项目的提出	(196)

第二节 对平等互利国际经济合作的寻求	(201)
一、中国商人的主观愿望	(201)
二、事与愿违的合作结果	(208)
第八章 中美丝商外交与中国丝业改良的起步	(221)
第一节 中美丝商外交的开始及其意义	(221)
一、中美丝商外交的缘起	(221)
二、中国丝商参加第一次丝绸博览会的意义	(226)
第二节 中美丝商外交的进步和作用	(231)
一、第二次丝绸博览会与中美丝商外交	(231)
二、中美丝商外交对中国丝业改良的作用	(237)
第九章 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与商人经济外交的进步	(245)
第一节 太平洋商务会议的商人经济外交性质	(245)
一、太平洋商务会议的缘起	(245)
二、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商人的直接经济外交活动	(249)
第二节 中国商人参与太平洋商务会议的作用和意义	(253)
一、力图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环境	(253)
二、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的成效与影响	(260)
第十章 资产阶级与战时工厂内迁	(269)
第一节 上海工商界与工厂内迁	(269)
一、上海工商界与工厂内迁的发动	(269)
二、工厂内迁中工商界与政府的合作	(274)
第二节 工厂内迁的作用和意义	(278)
一、厂矿内迁与后方的工业建设	(278)
二、工厂内迁与资金内移及后方金融业发展	(288)
三、工厂内迁与后方商业发展	(301)
四、一次异常的工业化空间传动	(307)

第一章 清末民初资产阶级的 实业救国潮流与经济民族主义

实业救国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奋斗始终如一的一条救国道路，在清末民初时尤为突出。它企图通过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以拯救民族危亡，带有很浓的经济民族主义色彩；它的内在含义和表现方式则显示了资产阶级的经济民族主义观念和行为的理性化趋向，并对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 实业救国与经济民族主义思想

一、郑观应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和“商战”论

在商人中最先显示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是郑观应。郑观应（1842—1922），原名官应，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58年，参加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赴上海学习经商。次年，经同乡买办徐润介绍到宝顺洋行工作，旋升任买办，并兼营自己的商务，投资英商公正轮船公司。与人承办和生祥茶栈，后充当扬州宝记盐务总理。1874年起，担任英商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并自行在长江各口及沿海港口开办揽载行、杂货号和钱庄，积累大量资本；同时开始入股洋务民用企业，并以太古洋行买办身份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襄办和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等职务。在此期

间，逐渐产生维新思想，1880年刊行《易言》^①一书。1882年辞去太古洋行买办，专任轮船招商局帮办，翌年升任总办。中法战争爆发后，应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之邀，赴南洋一带侦探敌情，为支援台湾防务奔走。中法战争结束后，隐居澳门近六年，将《易言》扩写成《盛世危言》，于1891年基本写成，标志其维新思想成熟。《盛世危言》五卷本于1894年刊行，翌年增订新编为十四卷本，1900年又增订新编为八卷本。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经济观念，两者密切相关。郑观应早在1870年年末，就表达过自己的民族主义观念。他认为：“中国自开海禁，藩篱尽撤，尤属古今之变局，宇宙之危机也。”^②面对这种危机，他主张摒弃中国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观念，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自行通商贸易。他说：“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通商以来，各国恃其强富，声势相联，外托修和，内存覬觐，故未列中国于公法，以示外之之意。而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正所谓孤立无援，独受其害，不可幡然变计者也。”“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所谓彼教之来，即引我教之往，风气一开，沛然莫御。”^③中国亦应“广开海禁”，与各国“立约通商”，则“一变而为华夷联属之天下矣”^④。又进一步指出：“欧洲各邦，以通

① 关于《易言》的版本有两种说法：一是据郑观应自己说，《易言》三十六篇本于1874年在香港刊行，因“丑不自匿”并惧“僭且招尤”，而尽量收回，后删并为《易言》二十篇本。二是认为《易言》三十六篇本只有1880年中华印务总局的一个版本（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收入该版本）。这样《易言》二十篇本应是1882年前后问世的。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编辑说明”，第2页。

② 郑观应：《易言（三十六篇本）·论边防》，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页。

③ 郑观应：《易言（三十六篇本）·论公法》，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7页。

④ 郑观应：《易言（三十六篇本）·论公法》，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6页。

商为大经，以制造为本务。”中国与之通商，“举凡外洋之货，我华人自营运之；中土之货，我华人自经理之。扩其远图，擅其利藪，则洋人进口日见其衰，而华人出洋日征其盛，将富国裕民之效，可操券而得焉！”^① 这表明郑观应的民族主义观既是一种开放型的民族主义观，又是一种世界各国应平等相处的民族主义观，也是他的经济民族主义观念的基本理念。

19 世纪后期中国重商思想的兴起，是受西方重商主义的影响。西方重商主义是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大约从 15 世纪到 16 世纪中叶是早期重商主义阶段，这一时期的重商主义主张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增加金银输入；在对外贸易上奉行“少买多卖”的原则，以换回更多的金银，达到积累货币财富的目的，所以被称为“重金主义”，或“货币主义”，或“货币差额论”。大约从 16 世纪下半叶到 17 世纪中叶是晚期重商主义阶段，这一时期的重商主义主张发展工业，扩大对外贸易出超，保证大量货币的输入，达到积累货币财富的目的，所以被称之为“重工主义”，或“贸易差额论”。两个阶段重商主义的共同点则是将货币作为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标准。

到 1884 年中法战争后，面对列强侵华经济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又受西方重商主义的影响，包括郑观应在内的一些早期维新人士，开始摒弃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提出了“通商富国”的主张。如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都有过相关的论述。其中尤以郑观应的论述最为全面系统。他指出通商对富国的重要性，并指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②，“盖西人尚富强最重通商”^③。更有意义的是，他还主张中国应摆脱在对外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发展资本主义工矿业，以抵制外国的经济入侵，进而明确提出了“商战”这一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思想。

① 郑观应：《易言（三十六篇本）·论商务》，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 73 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 604 页。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 607 页。

在郑观应之前,已有人曾使用过“商战”一词。最早出现于1862年曾国藩致湖南巡抚毛鸿宾函中:“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①。1878年御史李国璠在奏折中引用曾国藩这一说法,指出“商战”系“洋人通商弱人之实情”^②。稍后薛福成也提出了类似看法:“昔商君之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也。”^③但都是泛泛之谈。

郑观应则是比较系统地提出商战思想的第一人。他在《盛世危言》中专门写有《商战》^④一文,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商战思想。一是关于商战的直接含义。他所说的商战就是中国与列强的经济较量,以发展中国工商实业为抵御列强侵略、争取自强的必由之路,即所谓“彼即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二是关于西方对中国商战的性质。他认为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商战)较之军事侵略(兵战)危害更大。他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而且“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况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⑤。因此,中国对西方的抵抗和防范,不仅要“讲求战事”,更要讲求商事,“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而且兵战是短暂的,商战是持久的。三是关于商战与兵战的关系。他指出,“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要以商战为最终目的;而且,兵战以商战为后盾,只有工业发达,经济富裕,才能制造和购置先进武器,为兵战张本,即所谓“寓兵于商”。四是关于商战的地位。他认为商战是一切外交事务的中心,甚至战争亦为商而启。他说:“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

① 曾国藩著、编委会编:《曾国藩全集》,第24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521页。

②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③ 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0页。

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盛世危言·商战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86—597页。以下所引郑观应言论未注出处者,均引自此文。

⑤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95页。

兵船为商置也。国家不惜巨资，倍加保护商务者，非但有益民生，且能为国拓土开疆也。昔英、法屡因商务而失和，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初与中国开战，亦为通商所致。”^①

对于中国应对西方商战的办法，他还提出了三点最突出的具体主张。

一是对外强烈要求收回海关主权。自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规定关税协定以后，中国的关税主权逐渐丧失，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严重压抑着民族工业的成长。因此，早期维新人士大多主张收回关税自主权，以保护民族市场和民族工业，增强中国的商战能力。

郑观应对中国丧失海关主权的危害，感受颇为深切，力主实现关税自主及独立的关税壁垒政策。他从国际公法的角度，谴责列强强迫中国实行协定关税的不平等性，论述中国收回关税主权的合理性。他指出：列强强减中国税率，依据何在？中国货船致外国，所纳之税数倍于他国，凭何而区别对待？中国所征各国货税甚轻，而各国所征中国货税从重，公道何在？进而他依据《国际公法》提出自定税则，并实行关税壁垒政策的主张。他说：依据国际公法的原则，“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重轻，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而且“某国重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重收某国之税相抵制，某国轻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轻收某国某货之税以相酬报”。据此，中国理应从外国人手中收回海关管理权，使海关总税务司及各口海关税务司“皆渐易华人，照章办理，庶千万巨款，权自我操”^②。

二是对内呼吁发展民族工业以抵制洋货。他强调采用先进的机器和技术，振兴民族工业的重要性。他认为“知其通塞、损益，而后商战可操胜券也”，即首先考虑本国的商品销路是否畅通、对外贸易是否受益的问题，才能在“商战”中取得胜利。而要解决“通塞”、“损益”这两个问题，则必然提高工艺水平，使本国的商品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96页。

② 郑观应：《公法》、《税则》，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388、546页。

力。因“商务之盛衰，不独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①。他将西方国家“商务之源”归结于“机器为先”，“尝阅西书，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中国“皆因无机器、格致院讲求制造诸学，而无商务通例恤商惠工，是以制造不如外人之精，价值不如外洋之廉，遂致土货出口不敌洋货之多，漏卮愈甚”^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强调机器生产的同时，还提出了“自造机器”以振兴民族工业的主张。他说：“人但知购办机器，可得机器之用；不知能自造机器，则始得机器无穷之妙用也。宜设专厂制造机器，择现在已经用过之各机器，先行仿造；然后向外洋购置各种未经购用之机器，一一仿造。虽不能自出心裁远驾于西人而上，而果能步其后尘，纵不能得外洋之利，则中国之利自不至外溢矣！各种机器自能制造，则各种货物亦能制造。所造之物既便自用，且可外售于人，不致全以利权授外洋矣。外国进口之货，皆人力之所为，而中国入口之货，多天生原质，以此相较，孰优孰绌，不待智者而知之。”^③ 他实际上提出了中国早期工业化道路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不能仅仅停留在进口外国的机器设备、出口本国的自然资源这种“商战”的初级阶段，必须在引进外国的设备技术的基础上建立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和进口替代的工业；唯有如此，才能在“商战”中开拓本国商品的国内外市场，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实现工业强国的目标。

三是主张因时制宜改革官督商办制度，采用公司制度。他对官督商办制度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在甲午战争前，他赞成采取官督商办，认为官办和商办都有不利因素，采取官督商办则可以克服两者的弊端。“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有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股招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④ 同时他也指出官督商办企业应该“仿西法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588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五》，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26页。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五》，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27页。

④ 郑观应：《盛世危言·开矿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704页。

颁定各商公司章程”，“务使官不能剥商，而商总商董亦不能假公济私，奸商墨吏均不敢任性妄为”^①。当然，他主张采取官督商办形式主要还是指采矿这样投资较大、涉及地方利益的资源性产业，并非是指所有的近代工商业。而且官的职责仅在于颁行税则，恤商惠工，而不是控制、干预企业的经营。其主要倾向还是提倡商办形式：“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②甲午战争后，郑观应对官督商办的弊端有了更多认识，在1901年写的《商务叹》揭露了官督商办企业的种种弊端：“办有成效倏变更，官夺商权难自主。开平矿股价大涨，总办擅自合洋贾。地税不纳被充公，利失百万真乳腐。电报贬价归国有，不容商董请公估。轮船局权在直督，商欲注册官不许。总办商董举自官，不依商律由商举。”“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③

二、实业救国思潮的经济民族主义色彩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列强经济侵华势力的升级和膨胀，中国资产阶级在商战思想的基础上，兴起了一股实业救国的思潮。实业救国思潮，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逐渐了解和不断接触中产生和形成的，到清末民初时已形成下述几个方面的主旨。

第一，以实业为拒侮之方。实业救国论者所以提出以振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来拯救民族危亡，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之败不仅败于西方列强之兵战，而且更败于商战。他们从西方列强向东方各国扩张的历史过程中已认识到：“帝国主义之盛行，其目的不在领地之开拓，而在贸易之扩展”，不可以古时“轻功好武”之民族战争来看待今日之民族冲突。“今日之世，兵战不如商战”，兵战不过为商战之先导而已，“列国因求贸易之发达而有兵，复因求贸易之发达而有战”。列强对中国之扩展，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五》，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26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12页。

③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9—1370页。

自庚子之役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之后，更使“吾国遂亡于列强共同之经济侵略之手矣！庸詎知经济上之侵略，较之政治上之侵略，其为祸乃更烈也”^①。自英国用鸦片敲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西方各国利用历次战后的不平等条约，日益增多地向中国输出商品和资本。而中国输往各国的商品，则由于海关主权丢失，苛捐杂税繁重，产品质量低劣等原因，不能相应增加。外国的商品倾销和在华投资设厂，使得本国工业的发展受到重重妨碍；中外贸易的不平衡，也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国家财政日趋贫困。因此，外国的对华经济扩张，既直接威胁到资产阶级经济活动的生存和发展，也将使国家的财政陷入破产的境地。如上海商务总会主办的《华商联合报》曾撰文指出：自开埠通商以来，列强各国“耗我菁华，腴我脂膏，横撻之，摧残之，鹰瞵鹗睹不遗余力；起视我通商各埠之华商，僵如木偶，不知不觉，尽被洋货潮涡卷入饿鬼道中，而柴立待毙”^②。巨额的外债和赔款，使“金融界遂现一绝大恐慌之险象”，国家财政濒临破产，“财政涸，则生命随之”^③，亡国就在眼前。在他们看来，外国的经济扩张既是其侵略中国的主要目的和手段，也是中国真正亡国的祸患所在。

他们还认为，实业不兴也是中国兵战屡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表面观之，中国兵战之败是由于武装不如人，“然武装非工商完备亦不足以达其强健之目的”。兵器因本国工业之落后而仰外人之供给，惟窳败滞钝者是购”；军费因“商业不振终属有限”^④。人既以经济扩张为亡我之道，我又因实业不振为致败之由，那么欲救中国于不亡，就要以世界“破国亡家之历史为鉴”，“以实业问题为先导，庶使国家得收易贫弱转富强之效”^⑤。

① 雨尘子：《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新民丛报》，第11期，1902年7月5日；14期，1902年8月18日。

② 江义修：《敬告华商宜速联合小本行商仿设日本负贩团周历内地畅销寻常日用土货以收天然固有之利权说》，《华商联合报》，第6期，1909年5月18日。

③ 林作屏：《商箴》，《华商联合会报》，第2期，1910年3月。

④ 余裴山：《对于第一次全国国货展览会之感观及将来工业之根本规划》，《农商公报》，第18期，1916年1月15日。

⑤ 遯庵：《上都察院书》，《华商联合会报》，第7期，1909年5月。

第二，以实业为强国之道。资产阶级在敌强我弱的强烈反差中进而想到，为何列强如此富强？中国如此贫弱？他们从世界各国的兴衰史中认识到，“近世以来，政局大变，列国倾向注集商战，经济竞争烈于军备”^①。欲立国于这个时代之中，必须发展实业，“惟实业足以左右世界之大势者，不特私人之自立以此，即国家之战胜亦以此”^②。近代世界历史已经证明，“经济充足，则国赖以富以强；反之则立见衰微，不被灭于人者几希”^③。因此，“一国家之贫富强弱，视其国之工业发达与否以为衡断”^④。

他们又进而指出，世界各强国无不以振兴实业而致富强。上海中华实业团的章程指出：“泰西各国，若英美法德与东海日本小邦，莫不轫强于实业振兴之继。”^⑤ 华商联合会也指出：美国“以工商立国，富甲天下”^⑥。孙中山也说：“今则美国，吾人知其为世界最富强之国也，然其所以致富强者，实业发达也。”^⑦ 在他们看来，“凡强国所以致此者，其原千条万端，而悉归于实业”^⑧。振兴实业是列强致强的根本原因。

既然世界已进入经济竞争之时代，列强又以振兴实业而致富强，那么中国欲适应世界之潮流，欲图富强之国力，亦应以振兴实业为根本之计。他们从适应当时世界经济竞争潮流出发，认为欲竞胜于这个世界之中，就不能再像“古时以武力为主，实业辅之，今则最后之决胜，归于实业”^⑨；再不能重农轻商，而应当“从事实业，以与世界为工商之逐鹿”^⑩。他们又从效法列强出发，提出：“欲药吾国贫弱之根原，正当师

① 林作屏：《商箴》，《华商联合会报》，第2期，1910年3月。

② 遯庵：《上都察院书》，《华商联合会报》，第7期，1909年5月。

③ 陕魔：《兴办西北实业要论》，《夏声》，第1号，1908年2月26日。

④ 耕辛：《记求新制造厂状况及厂主朱君志尧之谈话》，《中华实业界》，第12号，1914年12月10日。

⑤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62页。

⑥ 遯庵：《上都察院书》，《华商联合会报》，第7期，1909年5月。

⑦ 张其昀：《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1960年，第30页。

⑧ 汪幼安：《本报宣言》，《中华实业丛报》，第1期，1913年5月1日。

⑨ 阙名：《论赴美赛会与我国前途之关系》，《民国经世文编·实业》，第12页。

⑩ 汪幼安：《本报宣言》，《中华实业丛报》，第1期，1913年5月1日。

美人向来之政见”，“以工商立国”^①。他们更满怀信心地指出只要实业发达了，中国定能富强起来，不仅可以“药贫挽弱，持危救亡”，而且可以“执牛耳于太平洋”，“雄飞于二十世纪”^②。总之，他们已普遍认为，“国之大本在于实业”^③。

第三，以实业为治国之本。清末民初亦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时期，经济衰败，人民失业，民变纷起。无论是为国家谋长治久安之策，还是为自己谋生存发展之路，资产阶级都迫切希望社会秩序尽快安定下来。那么如何才能使社会秩序安定下来呢？他们认为，“当以实业为唯一之先务”。这是因为国家之治乱取决于民生之富贫，“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生计为先，故民生之一息一耗，即为国家治乱之所在”^④。所以，“欲图国家之长治久安，必于农工两业加意提倡而维持之，以冀富裕下等人民之生计”^⑤，使之安居乐业而无变乱之心。就是宪政之进行亦要依靠实业之兴盛。只有让人民先“足其衣食”，有其“权利义务”，才能使人民有“廉耻荣辱之心”，有“爱国奉公守法”之行；只有先使民力充足，才能使“国家一切庶政”有所依靠。因此，欲图宪政之进行，“不可不知其本”在于实业之振兴^⑥。民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袁世凯政府，还是工商资产阶级，都曾把政权之稳固、财源之开拓、民生之安定、主权之保全系于振兴实业之上，也给“实业救国”思潮赋予了“实业建国”的新意。

由此可见，实业救国思潮的成因和主旨都与民族的救亡、生存和振兴密切相关，显示出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① 逯庵：《上都察院书》，《华商联合会报》，第7期，1909年5月。

② 汪幼安：《本报宣言》，《中华实业丛报》，第1期，1913年5月1日。

③ 《中华国货月报批准立案》，《时报》，1915年8月12日。

④ 胜因：《实业救国之悬谈》，《东方杂志》，第7卷第6期，1910年7月31日。

⑤ 张肇熊：《各处宜亟兴工厂以救民穷议》，《东方杂志》，第7卷第10期，1910年11月26日。

⑥ 胜因：《实业救国之悬谈》，《东方杂志》，第7卷第6期，1910年7月31日。

三、实业救国论的理性化民族主义观念内涵

一般来说，民族主义观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对本民族的自我认识；（2）对异民族的客观认知；（3）对本民族的忠诚感；（4）对异民族的隔阂感。从实业救国思潮基本内容来看，反映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何种民族主义观念呢？

在对本民族和异民族的认识方面，看清了本国的贫弱和列强的富强，抛弃了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夜郎自大”的传统民族主义观念。持实业救国论的资产阶级，不仅从国家军事和外交失败中看到了本国的软弱，而且在与列强各国的经济交往中亲身体会到了本国的贫穷和落后。并尖锐地指出军事、外交之软弱，皆渊源于经济之贫穷和落后，若不改变经济上的贫穷落后状态，那么无论是实行立宪也罢，成立民国也罢，都不能使中国改变贫弱的地位，甚至有灭亡于列强经济扩张之下的危险。他们郑重指出：“虽吾国口谈改革，迁延至十余年，一二热心实业家，百事经营，欲一新社会耳目，卒鲜成效，反滋外人野心，蹙我愈急，几欲尽握我版图，为彼族殖民地。倘不振起全国企业思想，以逐贸风潮流，徒恃幅员之广，恐精血被人吸尽，形式虽存，肿胀之病夫而已，其毙也可翘足待”^①，更不能“与五大强国并相抗衡”^②。

这种敢于承认和正视人强我弱的客观事实，表明资产阶级对本民族和异民族的认知水平的提高。他们已不像传统民族观那样孤立地认识自我，而是把本民族放到世界中加以比较，以世界强国作为估评本民族强弱的参照系。从而才在强烈的贫富、强弱反差事实面前，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贫弱，别人的富强；才改变了传统的自我认识，抛弃了以我为中心，唯我为优等的传统民族观。

在对待异民族文明的态度方面，确立了学习世界一切先进文明，联合世界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观念，抛弃了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由于认识到了人强我弱的事实及其缘由，便有了学习强国的想法：“睹人之

① 陕魔：《兴办西北实业要论》，《夏声》，第1号，1908年2月26日。

② 皮生：《策国民之前途》，《夏声》，第5号，1908年6月23日。